

# 当张爱玲遇见林徽因



《偶遇的传奇——民国才女写真》，王鹤/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故发生过或深或浅的交集、牵连和因缘际会，真是好不生动的一场“群芳荟萃”！

因为前些年著录过一本关于张爱玲的拙作，研习写作过程中，深谙民国才女们的欢喜和哀愁。再加上这次回炉阅读《偶遇的传奇》，从“点”铺开到“面”，更为宏观地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女人们的美丽情致和艰辛不易。她们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倒令我们这些读者有了比较的机会。眼见群芳中，有的命运多舛，有的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生命道路的分岔，常造成各人迥异的运途，也不禁令人感叹造化弄人，红颜薄命，竟是连自己的活法都无从选择。我想，这大概就是本书书名“偶遇”的一层含义：一切似乎都有定数，可偏偏有那么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常在不经意间，人间世事便已物是人非。人与人的擦肩、人与事的铰合契联，因为偶然和意外频频发生，也往往教人愕然。

百年前的民国和百年后的现在相比，虽间隔百年光阴，可都属于社会变迁的剧烈动荡时期。不同的是，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先进的思想像铁锤一般一下一下地敲击着铁板一块的“超稳定”封建社会，从旧向新过渡的非常时期里，国家动荡，人

心浮动，这些女子同样难逃与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的重负。比如聂华苓在《三生影像》里回顾：在经历了战乱、流离、恐惧、忧愤、大江大海、骨肉分离……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这让我想起了同样是随着父亲从东北一路逃难到台湾的齐邦媛，其煌煌巨作《巨流河》便因承载了同样的山河家园破碎流浪史而厚重异常。只不过，民族的苦难竟叫这些柔弱小女子一肩挑，愈发衬托出了她们生命底色的黯黑苦涩。

当然，因为横溢的风情、才情，她们也成了这动荡年代不多的亮色。她们的文学或绘画、影视作品，在各自领域皆堪称佳品，这多半与她们出生于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和熏陶有关。她们有封建闺秀小姐的那种名媛气质，这是在当今看来非常稀缺的气质，令她们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总是吸引后人津津乐道于她们的出身、家族、背景。正如王鹤在走笔时总能以她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眼力观察到这些女人身世的最要害处，恰到好处的几句点评总能戳到痛处，一针见血，想必她也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女人。

然而，她们又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日渐滋生叛逆精神和自主意

识。她们不再遵守妇德，不再循规蹈矩，敢于挑战封建体制，敢于依照自我的期待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比如，她们敢在家族的压力和众人讥讽的眼神里结束旧式婚姻，甚至不惜和自己所爱之人同居，并不在乎所谓名分，只求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过得像自己。于是，这些名女人和徐志摩、胡适、张道藩等民国才子、政客、名流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时而惊心动魄，时而静好安稳，总之，结下的是—桩桩红尘男女的风月情债。

一百年的时间足够长，长到有许多情结已被打开，许多谜题也早已被人解答，我们和王鹤一起回望这些民国才女时，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可是，那些婉丽的身姿、高贵的灵魂，却因为时空的阻隔总显得影影绰绰、明明灭灭，好不令人心生浮想。

当张爱玲果真遇见林徽因，她必不会像叹息恋人相见的玄机那般感叹“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只会和这些同样才华横溢、兰心蕙质的民国女子们惺惺相惜，同悲共喜。因为她们同样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动荡，让她们过得颠沛流离，也正是这动荡，让她们成为了迷离又颠沛的乱世佳人。（潘飞）

当张爱玲遇见林徽因？本不想以此为本文取名，还觉得这样凭空捏造的可能性颇有些荒诞，但转念一想，恐怕只有如此搭配才能将这些才女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乱象形容得尽致淋漓，并且，28位民国才女在一本本书中的集合，像满园争芳，颇为热闹，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更何况，她们彼此之间还因为各种缘

## 读书有感

### 《牛虻》书上的泪痕

我垂垂老矣，不免常常怀旧。孩提时代，因为没钱，常到路边书摊看小人书，直到书摊的瘸腿老板用手推推我，我才悻悻地离开。那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那里的书摊打开了我放眼世界的窗口。

记得有一天，妈妈给我买两个大饼的早点钱，我买了一个大饼，用克扣下来的钱到书摊去过瘾。我看到一本小人书封面上画的人很可怕，他的前额和左颊有一条长长的弯曲的刀伤疤痕，书名叫《牛虻》。我看着看着，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牛虻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我不十分理解，但我知道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为一种伟大而神圣的事业而奋斗。当我看到牛虻被士兵押到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下，站在挖好的土坑边上的时候，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中弹的牛虻并没有死，他面对士兵，用残缺的手抹去脸上的血。又开枪了，牛虻倒了下去，他在地上扭动着挣扎着，拖了一条腿跪了起来，面对士兵发笑：“又打歪了！再来一下，看成不成……”我实在憋不住了，呜呜地抽泣起来，把瘸腿老板愣住了。

牛虻那桀骜不驯的身影和我那仿佛流不完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瘸腿老板带着同情的口气说：“这小鬼真的发毛病了。”可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毛病。我只觉得那个牛虻使我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人生中过去不懂的事情。

后来我读初中，在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带回家阅读。在一旁织毛衣的妈妈听见我轻轻呜咽，再仔细一看我红红的眼睛，问我：“怎么啦？哭什么啦？”我拿着润着泪水的书本，急忙走开，说：“没什么，你不懂……”

五六十年来，我读过不少书，但像《牛虻》这样震撼我心灵的书不多。我有时候想，如果有人看到当年留下我泪痕的《牛虻》，也许觉得可笑。但他一定不知道，正是《牛虻》影响我的成长、生活和进步。

我还想说，我这辈子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定程度上正是牛虻那句经典的话——“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

（姚全兴）

### 《感动中国》的幕后团队

**推荐理由：**本书由《感动中国》核心主创、历年颁奖词撰写者刘凯创作，采访所有参与制作《感动中国》的幕后人员，对大量获奖人物进行回访，首次披露台前幕后和人物评选中的许多感人细节。幕后团队首次出镜，讲述了十年来的温暖与感动。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名单上，有40个左右的名字：大学校长、政府高官、媒体巨擘、作家学者等等。他们签下自己的名字，推荐自己认为感动的人，也帮节目组判断哪些人更适合《感动中国》的标准。这个名单由几部分人构成：媒体人、教育界、慈善界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名人，政府官员，曾经荣获《感动中国》荣誉的人。

常常会有观众来信问，这些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对外公布？其实这些名单从来都不是秘密，每年都会公布在各大合作网站上，在推选委员一栏里，有他们的照片、身份，有的网站甚至列上了他们的履历。

2002年组建《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的时候，节目组并没有明确的意见，要在哪个领域内寻找推荐者，只是很感性的，每个人都推荐自己认为可以信赖的人。可最初凭印象列举出来的，仅仅只有12个人。12个人当然不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判断，而且这个小名单带有强烈的电视媒体人的兴趣取向。经过不断去除个人偏见，考虑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在整个活动中潜在的意义，慢慢的，这个名单丰富起来。

名单的改变往往是因为一些人职务的变动。以《感动中国》2005年的推选委员名单为例，2005年的名单上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纪宝成校长对《感动中国》活动非常用心，每年都会为候选人物写下自己的评语。2011年，纪先生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他通



摘自《感动的力量》，刘凯/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版，有删节

过学校办公室转告节目组，自己不宜担任这个推选委员，希望由新任校长担任。于是，在《感动中国》2011年的推选委员名单上就有了陈雷露校长的名字。

2005年的名单上，还有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是央视主持人董倩向节目组推荐的。董倩说：“这真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官员，和我见过的许多官员都不一样，他的意见应该值得你们注意。”节目组并未和王振耀司长谋面，只是通过他的秘书转达了邀请他担任推选委员的意思。以后每年节目组都会收到他对《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评价，语言平实、真切、充满了情感，态度谦逊认真。

2010年，王振耀辞职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任院长，成为国内公务员中从司局级岗位上主动辞职的第一人。“王振耀不再担任国家民政部官员，还是不是我们的推选委员？”在某天午餐的时间，有人提到这个话题。讨论非常简单，没有人有异议，所以《感动中国》2011年推选

委员的名单上，仍然有他的名字。

推选委员会在《感动中国》推选过程中有两个功能：

第一，他们可以推荐他们认为感动的人。每一位推选委员都是在某个行业或某个区域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目光和判断常常让我们耳目一新。《读者》杂志的总编辑彭长城，几乎每年都会向我们推荐几位甘肃本土的候选人。《感动中国》2010年的人物王万青就是彭长城推荐的。而这个人物，此前很少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没有彭长城的推动，全国观众不可能知道这个上海知青在甘肃近50年的行医经历。

第二，《感动中国》节目组会把整理好的候选人，寄给他们，请他们帮忙判断，哪些人更适合《感动中国》的标准。

推选委员回复给节目组的推荐词是特别受重视的。

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推选委员以自己的阅历和智慧对候选人的判断和把握。这是一个特别的角度，也是朱波对记者所说“评选过程充满了人为因素”中的“人为因素”。每个人的职业、性格和经历都不一样，他们判断这些人物的角度交织起来，会为节目组提供很多启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梁建增常常提醒朱波：应该站在国家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也不要仅仅只是一个媒体，因为我们做的是“感动”节目。

而这些推选委员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担忧。完全站在一个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是难免偏颇的，无论是追求新奇、追求时效还是追求感人，这种对传播效果的热衷，是融在传媒人骨子里的，很难摆脱。而这些专家学者和在某些领域有特别造诣的人，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解读，会给《感动中国》节目组带来很多启发。

## 精彩书摘

### 更新书架



■《只是孩子》  
作者：[美]帕蒂·史密斯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2年版

一位是朋克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一位是惊世骇俗的艺术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只是孩子》回忆的是两人刻骨铭心之爱。1967年，他们在布鲁克林偶遇，她是离家流浪的女孩，他是荒废学业的男孩；1969年，他们在切尔西酒店蜗居，她是爱写诗的书店店员，他是爱画画的午夜牛郎；1971年，在摇滚乐中她越陷越深，在前卫摄影中他逐渐发现自我；1989年，她已成一代朋克摇滚女王，他却因艾滋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是孩子》像爱情故事一样开始，如挽歌一般结束。在作家马世芳看来：“帕蒂变成‘朋克教母’，实属意外，她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诗人。摇滚于她，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诗的载体。罗伯特在摄影界如雷贯耳的威望，乃至于生前身后作品掀起的争议，已是当代艺术的必修教材。帕蒂和罗伯特从一开始的爱侣关系，到罗伯特发现自己的同性恋性向，几经挣扎而至坦然面对，他们始终相互陪伴，相互理解。这份生死与共的情感，即使后来两人生轨迹渐行渐远，仍然紧密相系，至死不渝。”2010年11月7日，美国国家图书奖颁给了《只是孩子》。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  
作者：[明]兰陵笑笑生  
评点：刘心武  
出版：漓江出版社  
2012年版

郑振铎曾说过：“《金瓶梅》的社会是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存在着的。”刘心武点评《金瓶梅》同样也基于这点，他感慨道：“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头上，我们面临着许多的困惑，怀有非常强烈的企盼，因而派生出了若干思潮的激荡，乃至于种种人际、群际的摩擦与冲突。在这种情势下读《金瓶梅》，我以为我们有可能比前人更悚然于人性的诡谲莫测，却又可能比后人更刻骨地领略到冷静从容的叙述风格那魅惑的美感。”本套书采用的是《金瓶梅》词话本，将原文和点评文字相结合，渗透在每回之中，或长或短，有内文穿插点评，亦有回前、回后总评，评人物、说情节、道玄机、探幽微，透着敏锐独特与老辣挺健。